



当代社会与政治思想译丛
尹树广 鉴传今译

领导权 与 社会主义的策略

——走向激进民主政治

[英] 恩斯特·拉克劳 著
查特尔·墨菲 著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领导权与 社会主义的策略

——走向激进民主政治

【英】詹姆斯·斯科特

程立华 译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James C. Scott
Edward Hooper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932.3
2005

领导权与 社会主义的策略 ——走向激进民主政治

[英]恩斯特·拉克劳 著
查特尔·墨菲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黑版贸审字 08 - 2002 - 02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译.—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4
ISBN 7-207-06011-4

I. 领... II. 尹... III. 社会主义—研究
IV. D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9128 号

责任编辑:魏杰恒

封面设计:李梅

当代社会与政治思想译丛之一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

——走向激进民主政治

[英]恩斯特·拉克劳 查特爾·墨菲 著 尹树广 译
鉴传今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编	150008
网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刷	黑龙江教委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毫米 1/32·印张 8.5·插页 1
字数	170 000
印数	1 - 4 000
版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207-06011-4/D·784

定价:15.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恩斯特·拉克劳 是一位政治理论家，曾经就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牛津大学，从1973年开始在艾塞克斯大学政治系授课，并且一直是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以及多所拉美大学的访问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NLB, 伦敦 1977年)，曾经发表过多篇政治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方面的文章。

查特林·墨菲 是一位政治哲学家，曾经在卢汶大学、巴黎大学、艾塞克斯大学、伦敦大学学习，一直是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在过去的几年里还一直在伦敦的城市大学和伦敦大学的韦斯特菲尔德学院任教。她编辑并参加撰写了《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伦敦 1979)，发表过多篇关于当代政治思想、新社会运动和女权主义理论的文章。



Watch her write

for 2003

Chantal Mouffe
and
Ernesto Laclau.

当代社会与政治思想译丛

中国博士后科学研究

黑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科研 **基金项目**

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

策划:尹树广

主编:衣俊卿

编委会(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立群 孔明安 尹树广 衣俊卿 刘振怡

李久军 李秋零 李 兵 陈春江 赵敦华

赵 林 柯锦华 姚大志 黄惠珍 韩东晖

靳希平 鉴传今 霍桂桓 魏杰恒

恩斯特·拉克劳 是一位政治理论家，曾经就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牛津大学，从1973年开始在艾塞克斯大学政治系授课，并且一直是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以及多所拉美大学的访问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NLB, 伦敦1977年)，曾经发表过多篇政治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方面的文章。

查特尔·墨菲 是一位政治哲学家，曾经在卢汶大学、巴黎大学、艾塞克斯大学、伦敦大学学习，一直是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在过去的几年里还一直在伦敦的城市大学和伦敦大学的韦斯特菲尔德学院任教。她编辑并参加撰写了《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伦敦1979)，发表过多篇关于当代政治思想、新社会运动和女权主义理论的文章。

译丛总序

20世纪末的最后20年是中国哲学理性异常活跃的时期,我曾经从实践理性的复兴、主体意识的成熟、发展观念的更新、文化精神的重建几个主要方面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进展。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1980年代关于真理标准、人的主体性、传统文化的命运、传统哲学体系改革、哲学观念更新等一系列大讨论,1990年代发展哲学、交往理论、新儒学、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人学、经济哲学、公共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等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生长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哲学界的空前活跃和繁荣。然而,“热点”的频频出现和快速更替、新领域的相继开出和转换、新术语的不断涌现和流行,在推动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术研究的深度开掘和理论的厚重建构。

令人欣喜的是,世纪之交的几年,我们在中国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看到了某种“学术回归”的迹象。其标志之一是学术研究的心态开始走向平和与深沉。从对宏大的理论框架的追求转向细微的文本解读和思想的深度探索。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开始把积淀多年的学术思想转化为一些深度的、厚重的学术著作。其标志之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真正的跨文化对话和学术交流开始成为可能。如果这两方面的发展趋势紧密地结合起来,有希望回归到本真的哲学形

态,即文化批判层面上的批判性的对话和反思活动。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西学东渐和东西文化之争,1980-90年代又经历了逐步的对外开放,并且在世纪末汇入了全球化进程,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并没有开展起来。全球化进程中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包含许多层面。一般说来,日常生活层面的文化全球化的进程相对快一些,以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足球、牛仔、卡通等消费文化符码为标志的大众文化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并很快形成本土文化和全球文化之间的共处格局。然而,理论层面的真正的跨文化交锋和交流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实际上,如果我们冷静地审视一下,就不得不承认,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相对封闭地面对国际范围内的各种学术和理论思潮。无论是对西方思潮不加区别地一律冠以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潮加以彻底拒斥和无情批判的年代,还是以我们固有的理解框架对国外各种思潮和理论加以剪裁并批判地借鉴的年代,甚至在普遍进行翻译、介绍和研读的对外开放的年代,我们与国外学术界实际上保持着一种单向度的“独白”的状态,常常是既未进入西方学术思想的语境和文化关联,也没有进入西方学界的视野,更谈不上直接的对话、交流和交锋。在国际学术领域,我们往往自我“边缘化”。

基于对上述状况的清醒认识,目前中国学术界许多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方式开始探索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直接的、同时代的、近距离的、甚至面对面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机制,并通过一些高质量的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一些有远见的期刊的海外原创性学术论文的刊发,特别是通过对

同时代的国外著名的理论家和学者的新著的高水平翻译和文本解读,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在这里选译当代著名理论家在二十世纪90年代前后一批关于国家、民主、现代性的文化批判著作,包括《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拉克劳,墨菲 著 1985)、《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拉克劳著 1990)、《民主的悖论》(墨菲著 1996)、《批判的国家理论》(巴罗著 1993)、《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雅索普著 2002)等。此举的宗旨也是推进一种直接的真正的跨文化交流和对话机制的确立。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我们所选取的几位当代理论家和思想家,大多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相关,至少具有“家族相似性”,并且受到马克思的理论遗产的深刻影响。当然,任何“命名”都注定是残缺的和不完备的,并且具有误入歧途的可能性。重要的不是“命名”,而是这些理论家的深层的共同关切,他们在不同层面上,以不同方式关注困扰着我们时代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现代性的机制、基础、命运、困境和未来。而且他们共同代表着当代西方学术界中传统政治学、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之间界限的消解,深刻体现了理论的批判本质和开放性特征。记得在二十世纪70—80年代,随着阿多诺、卢卡奇、霍克海默、马尔库塞、萨特、弗洛姆等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巨星相继陨落,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的开始。但是,在二十世纪后20年,一方面是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一代领袖人物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视野,并且积极同后现代主义等当红理论思潮展开开放式的批判性对话,另一方面是德里达、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向马克思“致敬”

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积极对话,以及詹姆逊、吉登斯、拉克劳、墨菲、波德里亚等兼有后现代色彩和“后马克思主义”特征的理论家向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加盟,这些在我们面前又展示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地平线。

因此,翻译和解读这些同时代的理论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一,有助于我们打破哲学研究内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研究领域之间存在的僵硬的学科壁垒;其二,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中各学科之间更大范围的交融和相互开放,从而能够真正进入国外学术研究的语境,在深刻的文化批判的含义上开展真正的国际学术交流,同时,在这种交流中确立我们的话语权;其三,有助于推动我国学术界关于现代性研究走向深化。我们发现,这些思想家在探讨现代性问题时,并没有停留于宏大的叙事方式,没有仅仅从学理层面挖掘现代性之根基,而是像福柯的微观政治学那样,在社会机制的各个层面上反思现代性,这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现代性的命运,并探讨中国社会转型中现代性的前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翻译工作常常是异常艰难的,而又是“出力不讨好”的劳作。考虑到译者自身学术功底和语言能力的局限,这种困难就更加明显。好在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最难得的文本解读和思想对话,因此,无论如何,我们的劳动都不会是徒劳的。仅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开辟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一种可能的途径,有助于发扬哲学的文化批判和开放式对话的本性。

衣俊卿

2003年1月26日

中译者前言

翻译本书的目的是想为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认识当代全球化发展中的发达社会内部冲突提供参考资料。拉克劳和墨菲是当代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这本《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是他们的代表著之一,最初发表于1985年,2001年再版。中文版的翻译以第一版为准,同时翻译了第二版的序言。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受葛兰西、阿尔都塞、德里达、拉康的影响较多,尤其是他们更多地地在方法论上接受了后两者的影响,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复杂构造的、没有被充分固定的逻辑同一性。在他们看来,应该接受社会的多样性和非实证性,认识到对社会进行最后缝合的时刻永远也不会到来。尽管如此,在他们看来,这绝非是放弃当代社会斗争的领导权要求,相反,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应该对多样的反对资本统治的力量进行连接,把构造发达社会激进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作为当代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急迫任务。

这些主张与他们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有关。这一判断的思想背景是结构主义与主体实践哲学之间的争论。西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一直面临着方法论上的分歧,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其核心是现代社会究竟是奠定在

何种原则之上。争论实质上围绕着人的主体实践自我疏离与回归、社会结构的非主体实践特征两个不同方面展开的,这场争论并没有得到最后的结果。关于这两个原则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个人与社会、个别与一般、主体与结构、科学与实践辩证法之争,其结果是走向了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强调的是,追求这些对立终极的统一只能退回到抽象主义的乌托邦之中。走出困境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承认超越性的相对性和事实性的经验超越性。用一个显得悖谬的术语说就是“相对的一般性”、“有限的无限性”、“个别的一般”、“多样化的普遍”。主体中心理性的原则必须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同时社会的抽象一般性也必须放弃它的绝对透明性。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往往掩盖其意识形态和利益关系的真正背景,以此消除反抗资本主义的对抗力量。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彻底消除社会生活世界的多样性构造,这些构造因素之间在结构上的矛盾是难免的。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强调连接的可能性和其不充分的同一性,应对相对主义的指责,这些基本思想与后结构理论有着紧密的关系。后结构理论拒绝主体中心化的理性,这种理性既把它的对象夸大为绝对实体又把自身的话语和思想夸张成绝对真理,没有看到思想、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复杂多样关系。后马克思主义正是建立在对这种关系复杂性的认识之上,他们不是要维护绝对的同一性逻辑,而是要强调同一性逻辑的多样性前提。同一性不再被看成是在抽象原则上被封闭地构造起来的。后结构主义要揭示的具体性、中介性是

反对绝对先验总体的虚假性和主观性在先验领域把握和支配现象世界,那个被当成对立的现象世界,在解构的思想看来根本上是差异的流动、凝聚和分化、替代和置换,总体和局部不可分割地交织和转化的。后结构主义把机械主义和理想主义置于同一个层面上,反对主观构造的、主观理性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绝对原则,要把“总体”置于差异和区分、对抗和不断的转化的基础上。解构小心谨慎地拒绝重新引入绝对的总体,它利用形而上学话语,又不停地瓦解这种话语,在辩证和修辞之间有意识地策略运作。

后结构理论强调的是,规定性源于区分和差异相互交织运作的效应,一般性是不稳定的并且带有某种必然性。忽视这种多样性过程中一般性的效应,才是新型的彻底相对主义,例如一些符号结构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它们在反对绝对主义的过程之中,辩护的就是彻底的相对主义,其结果是:“解构扩大的结果是连接这一概念变得完全不可思考了。”^① 后结构的策略意识来自反形而上学的教训,要拒绝的是反形而上学向形而上学的各种倒退形式。后结构主义首先在方法论和本体论的层面上运作了这种策略,进而把这种逻辑推进到西方传统的政治、道德、伦理观念上。然而在社会政治的现实结构、构造和历史形成领域,这种策略的分析到了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那里才进入到当代资本主义政治斗争领域。与德里达在西方哲学和文化传统话语中实施解构不同,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直接从第二国际开始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

^①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英文版 1985 年,第 99 页。

力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丰富性,回到思想和现实的真正关系之中,从而扩大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和理论基础,使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以保持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影响力。

与全面转向微观现实领域和伦理道德文化的批判不同,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并没有放弃社会现实冲突和对抗的宏观领域。在他们看来,葛兰西是最早注意到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实践复杂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西方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依靠简单的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或消极的机械主义历史过渡就能取得成功。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市民社会的复杂结构,决定了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他详尽地阐述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革命实践的文化特征,并且影响了后来一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阿尔都塞、波朗查斯、奥菲、雅索普、奥林,在他们那里,实践哲学和科学的结构功能分析逐渐走向结合。应该说拉克劳和墨菲不仅仅是强调社会生活的结构分化,他们更为强调的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多样化的对抗力量,这些对抗力量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连接起来的可能性,使领导权问题成为必须认真对待的对象。在这一点上,他不同意哈贝马斯,而是主张领导权的前提不是生活世界中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和交往的根本内在一致性,相反是根本的差异性。

拉克劳对发达社会新的斗争形式的回答是:

“后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斗争形式从19世纪以来已经发展了性、性别、民族、种族等等方

面的特征。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是它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①

在他看来,在发达社会中,社会、阶级内阶层的分化使反资本主义大众一极的建立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如何适应这种社会多样化形式建立反资本主义斗争阵线,已经是传统二元对立方法不能解决的了。从波朗查斯那里我们看到重新在立场和意识形态上规定阶级的尝试,力求建立新的统一形式。而拉克劳和墨菲运用解构的思想强调实际斗争中的有限度的领导权,而不是阶级二元对立的领导权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绝对同一性逻辑的领导权。他所力求的是在各种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基础上同等地“连接”起更多的斗争形式。我们说这是在当前资本全球化形势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为了应对自由主义挑战所作出的选择。

尹树广

2002年冬

北京大学承泽园

^① 2002年12月拉克劳与中译者的通信。

第二版序言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最初在 1985 出版,并且从那以后一直是英语世界和其它地区许多重要政治理论讨论的中心内容。从那时以来,许多事情在当代背景下已经发生了变化。至于最重要的发展,提到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就足够了。对于这个发展,我们还应考虑到作为社会政治同一性构造中新典范基础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革。要认识 1980 年代初本书写作之时与当今时代的差别,我们必须记住,那时欧洲共产主义还被认作是充满活力的,超出了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而且此后吸引左翼知识分子的主要争论一直是新社会运动、文化多元主义、全球化、非领土化经济、与后现代有关的所有问题。象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说,短暂的 20 世纪在 90 年代就已经结束了,今天我们必须面临的是全新的问题。

如果说时代的这些变革如此巨大,当再次读完这本不算很新的书时,我们的惊奇在于,不必对它所揭示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前景提出疑问。从那以后发生的大多数事情非常切近地按照我们书中提出的模式发展了,而且那时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已经在当代的讨论中变得更突出了。甚至可以说,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理论方面被发展和中心化了,正如这两个问题在葛兰西主义的根源和领导权范畴的核心处被中心化了一样,研究当代的问题要比近来关于